

WUNIANZHI GAOZHI DEYU XILIE JIAOCAI

五年制高职德育系列教材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编写组 编写

苏州大学出版社

五年制高职德育系列教材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编写组 编写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编写组

主编 吴仕民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太平桥大街300号 邮编:215001)

苏州市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太平桥大街300号 邮编:215001)

开本 787mm×1095mm 1/16 印张 11 字数 275千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37-082-0 定价:12.00元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相城区太平桥大街300号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相城区太平桥大街300号

高等职业教育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邵健主编: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编写组编
写.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 7
(五年制高职德育系列教材)
ISBN 978-7-81137-085-0

I. 邓… II. ①邵…②邓… III. ①邓小平理论—高等学
校: 技术学校—教材②“三个代表”思想—高等学校:
技术学校—教材 IV. A849 D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9929 号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邵 健 主编

责任编辑 金振华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如皋市永盛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 如皋市环城南路 56 号 邮编: 226500)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11 字数 275 千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7-085-0 定价: 15.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35

苏州大学出版社

五年制高职德育系列教材编委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蔚 田 雷 朱坤泉 许曙青 李国宝
邹 燕 沈海牧 张以清 陈兴昌 邵 健
庞清秀 高 敏 袁琦兰 曾 天

本书主编 邵 健

编写人员 唐强奎 何 菊 殷 盈 杨祥财 邵 健
罗志勇

编写说明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生源为初中毕业生,学生入学年龄小,在校时间长,身心成长的跨度大、可塑性强,处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型的关键时期;二是培养目标定位于大专层次的高职应用型人才。五年制高职教育的这种特殊性,既对传统的学校德育教育提出了挑战,也为德育课程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机遇。

由于五年制高职办学时间不长,加之德育课程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相对于各专业课程教材的改革而言,五年制高职德育教材建设比较滞后,各院校基本上还是沿用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教材或选用普通高校的“两课”教材,造成教学内容或是简单重复,或是难以消化,德育教育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目前各院校对改革德育课程教材的迫切需求,我们在反复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组织有关高职院校的专家和学科带头人编写了这套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德育课系列教材。

编写该系列教材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懂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良好的思想品德,努力使自己成为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适应新世纪我国生产建设和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教材的编写力求体现以下特色:一是适当调整教材理论的难度深度,不强调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体现基础性和够用为度的

原则,并注意与初中阶段相关知识的衔接,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使学生听得懂,好消化;二是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职业需求,体现应用性要求,无论是内容的阐述、资料的选择,还是体例的编排、栏目的设计,都致力于提升学生应对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之在体验性学习中学有所得,学以致用;三是适应这一阶段学生认知发展的特殊性,教材从内容到形式注意丰富多样,有的在每章开头设有学习提示,简要告知本章主要内容和意义、学习目标和教学方法;有的则在正文中按需设置了多个栏目,或是启发思考,或是解疑答难,或是延伸拓展;每章结尾都安排了思考练习或探究活动,使学习过程生动活泼,富有成效。

五年制高职德育教材建设是一项带有探索性的工作,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尽管我们作了很大努力,但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不足。祁请不吝指正,以便我们在以后的修订中不断完善。

五年制高职德育系列教材编委会

前言

新时期我国正经历着整个社会层面的改革,同时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正确处理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正在成为每个有爱国主义情怀的青年学生所积极追求的目标。当代高职学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他们更多地接触现实社会,对社会的观察和认识也趋于实际和深刻;他们不仅仅是社会道德和规范的评论者及捍卫者,更是社会价值观的实践者和参与塑造者,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应成为他们面对现实进行选择的指针和规范。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主要是针对职业院校学生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育的公共基础课程,目的是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全面理解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进行思维创新,增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自觉地投身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

本教材按照教育部颁布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结合职业院校德育课程的规律和特征,大胆改革教材编写方法,抓住本课程兼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遵循青年学生认知的基本规律和时代对青年学生应具备素质的要求,提高内容的针对性、实效性,从身边真实、具体的现实情况讲解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从单纯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转向重视对学生分析能力、情感认知的培养。教材分为九章,力求体系完整,内容充实,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编写中还引用了一些重要的文献及数据,论述角度和提出的观点、列举案例独具匠心,深入浅出,力求比较系统、生动具体地论述该课程的理论和知识,从而引导学生对理论学习和研究保持浓厚兴趣。

本书由南京铁道技术职业学院(苏州校区)邵健任主编并拟定编写提纲。参与编写的老师有:唐强奎(第一、三、九章)、

何菊(第二、六章)、殷盈(第四章)、杨祥财(第五章)、邵健(第七、八章)。最后由邵健、罗志勇修改定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苏州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书的责任编辑在审稿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作为一次尝试,愿本教材的编写能为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帮助他们学习政治理论有所帮助。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本书一定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师生及各界同仁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今后的修订和完善。

编者

2008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章八第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内容	(13)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15)
第二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章六第
第一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0)
第二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25)
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32)
第三章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章三第
第一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38)
第二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	(42)
第三节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	(47)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第一节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53)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58)
第五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背景	(64)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72)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77)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第一节 “三步走”战略构想与党的战略目标	(82)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	(89)

第三节	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95)
-----	----------------------	------

第七章 “一国两制”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第一节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103)
第二节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109)
第三节	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	(113)

第八章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1)	第一节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120)
(11)	第二节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30)
(12)			

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

(5)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136)
(10)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146)
(20)	第三节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153)

(25)	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学大纲	(162)
------	----------------------------------	-------

(40)	主要参考文献	(165)
------	--------------	-------

(45)			
(55)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第一章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一面伟大旗帜。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除了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后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后,所作出的实事求是的历史性决策,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工作。

作为朝气蓬勃的当代大学生,肩负着新世纪的历史重任,肩负着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全面推向更高阶段的神圣使命,应该更加自觉地认真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原则、方法,并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去。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的名词。这个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凝结了几代共产党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带领各族人民艰辛探索而总结出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加显示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化的光辉历史。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化,不仅成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法宝,而且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必然选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

一、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一) 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

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当代中国,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切理论的产生,都是同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邓小平理论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资料卡片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使近40个国家转变成了新兴的民主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和巴勒斯坦等中东地区国家出现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尤其引人注目。据国际机构“自由之家”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只有25%的国家、35%的人口生活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不断发展。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国际法的权威性不断提高;国际多边协商谈判机制日益成为处理国际问题的通行机制;欧盟的诞生为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创造了超国家联盟的民主政体新形式;为防止美国霸权主义的形成,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一致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很难实施;等等。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这些进展都清楚地表明,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主义政治时代正在向以国际联盟体为基础的超国家主义或国际主义政治发展,建立在民主政治原则基础上的世界政治一体化的全球主义政治时代已初露端倪。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不断增强,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日益增长。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不同程度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围绕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依然时起时伏,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从原来的对抗逐渐转向加强对话和接触,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针对这种时代主题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提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如果没有这种和平的环境,我国很难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也很难产生树立于这一建设实践基础之上的邓小平理论。和平是发展的根,和平促进了发展,世界的和平带来了世界的发展。特别是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的面貌,从而使社会经济领域越来越成为竞争的焦点。世界各国都在利用新技术革命创造的良好契机,寻找一种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以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实力的较劲,而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更多地依靠本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发展与和平一样,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时代主题的变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而世界的发展,更鞭策着我们加快

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稳定发展,从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更何况世界的发展本来就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面对当今时代主题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去探求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同时代主题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这是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的时代背景。

(二) 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1. 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依据

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都是建立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根据。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资本主义世界因其固有矛盾的作用,因其内部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进步划时代的事件,初步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资料卡片

“二战”后,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欧洲有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亚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丁美洲有古巴共和国。

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只是新的起点。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就面临着繁重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由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大都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内,而且社会主义建设属于开拓性的事业,没有什么成功的实践经验可借鉴,更需要人们去探索和研究,寻求一条符合各自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有过许多教训,中国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对这种实践的反思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在中国,在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里,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建国伊始摆在中国人民、尤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难题。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虽然比较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但由于当时的基本思路仍是以苏联既有模式为根据的,所以走了一条弯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资料卡片

苏联模式

所谓苏联模式,如果仅就其内涵本身而言,可以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苏联模式表现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总之,这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经济体制,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

其次,从政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对内,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而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又是由个人意志所操纵的。这就造成了党政不分,共产党领导一切,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民主集中制有名无实,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干部由上级委派,领导终身任职,基本上不受群众监督,最后形成个人高度集权,并由此衍生出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而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

再次,从对外关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是集中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即封建农奴主式的作风于一体的大国强权体制。它不顾别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对违反其意志的国家则严惩不贷,从舆论声讨、经济制裁直到外交孤立,甚至实行军事干预或占领,无所不用其极,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总之,苏联模式就是采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它的要害则在于树立个人崇拜。它无情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以长官意志取代民主集中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个人崇拜网,高踞塔顶的则是斯大林及其后任们。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闻名的赫鲁晓夫为例,他自己就又在制造新的甚至超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据一般统计,报纸刊登斯大林的照片,每年无非几十张,而赫鲁晓夫却年逾百张,1963年达到124张,1964年头10个月里竟刊登140次。可见,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正是苏联领导人用以指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法宝。

1956年春,苏联模式开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暴露出一定的弊端。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是这一探索的开始。而1956年8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遗憾的是,到1957年以后,这条基本正确的探索思路没有得到应有的坚持。由于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的干扰,中国共产党未能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国际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以致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破

坏。对此,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可以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正是在反省、总结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进而逐步形成了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邓小平理论体系。

2.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不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为现实依据的。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伟大实践,正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丰富源泉。这个理论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首先就是因为它来自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即是在实践中获得真知的;这个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在于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而且还不断地在新的实践中证实自己的真理性并获得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以其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勃勃生机和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的伟大变化,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是必须坚持的。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阅读思考

“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一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

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大跃进”是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

根据以上材料,谈谈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的重要意义。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 邓小平的光辉历程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邓小平一生的革命经历是紧密相连的。他的革命生涯富有传奇色彩。

邓小平生于1904年,四川广安县人,1920年至1925年赴法勤工俭学。此间,他加入了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1927年春回国,投入到革命大潮之中。1927年6至7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任中央秘书长。1929年至1930年,他同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广西先后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资料卡片

邓小平第一次遭贬发生在1933年,当时党中央的领导权被王明等人所把持,在根据地推行冒险主义方针。他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结果被罢了领导职务,调到红军宣传部主办的一份小报——《红星报》当编辑。

1934年10月,在长征途中,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参与红一军团的领导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同刘伯承一起领导创建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策略,充分显示了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卓越领导才能。他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我党的领袖地位和作用,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资料卡片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明确指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在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8年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任总前委书记,解放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华东诸省。

新中国建立以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2年任政务院副总理。1949年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参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参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重大问题的决策。

“文革”期间,邓小平两次被贬,又两次奇迹般地复出。



资料卡片

邓小平在“文革”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被认定为第二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范围内遭受批判。其“政治罪状”主要是: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煽动搞单干、包产到户;鼓吹要搞职称评定、实行学位制;反对个人崇拜;等等。1969年,65岁的邓小平被遣送到江西,在南昌市郊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厂——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做了一名钳工,在那里度过了三年艰难岁月。在江西的三年,他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结合中国实际,对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1973年,邓小平再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1975年1月,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中,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系统纠正“左”倾错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但这一切遭到了“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于是掀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0月,党中央恢复了他党内外的一切领导职务。邓小平领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1978年,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根据他的提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政治主张。1981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同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他主持和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1982年,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和历史性任务。1983年,邓小平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1984年,他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为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回归后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基础。1989年,党中央接受他退休的请求,邓小平离开了核心领导岗位。